

# 东西问 | 周光辉： 大一统中国何以越千年？（上）



2019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新社发 潘旭临 摄

自秦代以来，中国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且被打破后仍能重建，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如此独特的国家韧性从何而来？中新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就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多都瓦解了？

周光辉：世界史上，统治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并不罕见。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迭起兴衰的同期，西方世界存在过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等一统帝国，中东地区也出现过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是不逊于古代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家。

但在农业时代的交通、通讯和组织技术条件下，超大规模的物理空间带来了沟通和控制上的难题。如果仅依赖中央政府发号施令，国家决策和行政成本则十分高

一统体制演进过程，如何造就中国独特的国家韧性？

周光辉：在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的张力结构下，所谓国家韧性就是中国古代国家长期维系其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特性。农业文明时代，大一统体制的自然趋势是走向分崩离析。与大部分前现代大型国家相比，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独树一帜，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和科层制色彩的国家形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首先，秦代推动形成了文字的统一。“书同文”为大一统国家凝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初始条件，也为古代中国形成跨地域的文化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可能。相比之下，即便辉煌长久如罗马帝国，一旦拉丁文的书面语与口语脱节且口语出现地方化的演变，就再未能在分崩离析后重建。

中新社记者：大



“2021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年度盛典”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47个国家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同诵儒家经典。中新社记者 吕妍 摄

其次，中国古代形成并长期维护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文化叙事。以儒家为基底的“主体叙事”，将“定于一”作为“天下恶乎定”的答案，主张“隆一而治，二而乱”，并通过教化等实现再生产。这种叙事通过对人的影响而深刻作用于国家命运。即便王朝有所更迭，新王朝也倾向于建成一个典型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哪怕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

最后，士大夫集乡绅、官吏和知识精英三重角色于一身。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国策并创设太学后，知识和权力形成了制度化的联结渠道。特别是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以知识见长的士人源源不断进入官僚体系，为完善科层制官僚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西方直到15世纪大学体系发展后，其科层体系建设才有了人力支持，因此相

对“晚熟”。此外，士大夫阶层深受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主体叙事”浸染，是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坚定支持者，而在动乱分裂年代则为重建大一统做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新社记者：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推动国家韧性形成方面起到的作用有何异同？

周光辉：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宗教色彩，而中华文明虽包含佛教、道教等宗教流派，但仍是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世俗性文明。

儒家学说形成了对古代大一统国家合法性的系统性证成，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影响最为深远。相比之下，西欧、中东等封建王国所依赖的合法化系统来自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超验的一神教。



2021年1月，参观者在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新社发 黄金昆 摄